

论恩格斯的国家观：以《反杜林论》为中心

蒋 晶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6年3月22日；录用日期：2026年4月12日；发布日期：2026年4月27日

摘 要

本文以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反杜林论》为文本中心，系统探析了恩格斯的国家观思想体系。通过文本解读和理论分析，论文剖析了恩格斯对杜林先验论国家观的批判，阐述了国家起源、本质、职能及发展趋势的核心观点，揭示了恩格斯国家观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贡献。研究表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深刻论证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和历史暂时性，在与杜林的论战中，系统阐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新型国家形态建立的必然性，并探讨了国家权力走向消亡的基本条件，对当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关键词

恩格斯，《反杜林论》，国家观，国家权力

Engels's View of the State: A Study Centered on "Anti-Dühring"

Jing Jiang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March 22, 2026; accepted: April 12, 2026; published: April 27,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Engels's important work "Anti-Dühring" as its central text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Engels's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state. Through textu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paper examines Engels's critique of Dühring's a priori view of the state, expounds the core ideas concerning the origin, essence, functions, and developmental trends of the state, and reveals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of Engels's view of the state to Marxist state theory.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Anti-Dühring", Engels profoundly demonstrates the class nature and historical transience of the state,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in his polemic with Dühring,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form of state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explores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the eventual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power. This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ontemporary state governance.

Keywords

Engels, "Anti-Dühring", View of the State, State Powe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其国家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876年至1878年间，恩格斯撰写了《反杜林论》这一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对欧根·杜林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全面批判，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尽管恩格斯没有专门的国家理论著作，但《反杜林论》中蕴含的国家观思想丰富而深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清算了杜林的先验论和国家观，捍卫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特别是对国家这一“虚幻的共同体”的本质、起源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阐述[1]。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将政治行为视为“历史上决定性的东西”的先验观点，强调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指出国家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而不是相反。

学术界对恩格斯国家观的研究已有一定积累，但多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核心文本，对《反杜林论》中国家观的系统研究相对不足。从国外研究来看，早在1984年，大卫·洛弗尔在《从马克思到列宁》一书中指出，《反杜林论》在恩格斯思想体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它首次以系统化的形式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框架，成为后来无数理论工作者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入门读([1], pp. 45-47)。

近年来，保罗·布莱克利奇在《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恩格斯〈反杜林论〉》中进一步强调，该文本是恩格斯“最重要的理论回应”，旨在批判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内部兴起的改良主义倾向，但由于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唯一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论述”，任何试图重新解读马克思的人都必须首先处理这一文本([2], pp. 99-101)。此外，潘琴科等学者在2020年发表的《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法律与国家问题》一文中指出，从意识形态中立且无偏见的视角来看，《反杜林论》中的法律与政治问题仍未被充分研究，值得当代学者更多关注([3], pp. 86-92)。学术界对恩格斯国家观的研究已有一定积累，但多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核心文本，对《反杜林论》中国家观的系统研究相对不足。

国内学界对《反杜林论》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哲学或经济学维度，如李天姿指出恩格斯将杜林哲学的存在论部分“世界模式论”作为论战对象，集中驳斥了杜林哲学的基本原则——“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存在，存在的统一性在于思维”，并在分析杜林“世界模式论”的研究目的、内涵和方法的过程中，揭露了杜林哲学的先验主义实质及其祸根，宣告了杜林哲学体系的完结[4]。刘娜娜指出，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没有掌握关于氏族社会的资料，也并没有对所谓的国家产生于行政权力的观点进行系统地论述[5]。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虽在各自研究中触及《反杜林论》中的政治思想，但多将其作为恩格斯整体思想的一部分进行讨论，或侧重于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的维度，缺乏对该文本国家观思想的专门性、

系统性梳理，亦较少将其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等文本进行对勘式比较分析。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研究不足，深入挖掘《反杜林论》中的国家观思想，并将其与恩格斯其他相关著作进行解读，系统阐述恩格斯在批判杜林过程中对国家起源、本质、职能和发展趋势的独特理论观点，揭示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贡献和当代价值。

本研究采用文本解读和理论分析的方法，以《反杜林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恩格斯其他相关著作，全面梳理恩格斯国家观的思想体系和理论特征。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理解，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思想指导。

2. 恩格斯国家观的理论渊源与批判基础

恩格斯的国家观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方面吸收了古希腊城邦思想、近代契约主义国家观、德国古典哲学国家观和早期社会主义国家观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了彻底批判和根本性超越。这种批判性建构在《反杜林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恩格斯通过批判杜林的错误观点，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2.1. 对杜林先验论国家观的批判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深刻批判了杜林的先验论国家观。杜林追随其“唯一重要的先驱者”卢梭，将国家视为“普遍意志”的产物，认为国家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一切方面都有协定的基础上，以相互帮助来反对不正当的侵害为目的。“个人的主权”构成杜林的未来国家的基础；它在多数人的统治下不应当被压制，而应当在这里真正达到全盛状态([6], p. 331)。

恩格斯批评杜林不是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出发，而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来理解国家，这种观点掩盖了国家的真实本质。在恩格斯看来，他的更加深刻的后继者从根本上补救了这一点，办法是把卢梭的东西最大限度地稀释，并加上用同样方式调制成的黑格尔哲学废弃物的稀汤([6], p. 331)，尽管披上了现代外衣，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脱离社会实际的抽象国家观。除此之外，恩格斯特别批判了杜林关于“维护权利的力量只会加强”的观点，指出这种观点忽视了国家作为特定社会集团利益维护工具的本质。杜林认为，仅仅从群众对个人或多数对少数的优势中引伸不出某种权利，权利的基础在于个人的自主权。恩格斯反驳了这一观点，强调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6], p. 388)。

2.2. 对早期社会主义学说国家观的超越

恩格斯还批判了某些早期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国家观，指出这些学说往往将社会制度的问题归结为认识问题，忽视了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深入分析。这些学说虽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尖锐批判，但对国家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抽象观念层面，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的社会属性和历史暂时性。

恩格斯用唯物史观彻底驳倒了这种抽象历史观，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 p. 284)。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的谬误，而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是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样，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让位给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它和正义、平等的原则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力。

恩格斯通过对各种错误国家观的批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立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不是超阶级的普遍利益的代表，而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形式和发展趋势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不是由观念或原则决定的。这一基本立场在《反杜林论》中得到了系统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反杜林论》中国家观的核心要义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通过对杜林错误观点的批判，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核心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和发展趋势等问题。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3.1. 国家的起源与本质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深刻揭示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他与杜林的先验观点相对立，强调国家不是抽象的个人自主权的产物，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7], p. 187)恩格斯坚决反对杜林将国家视为抽象个人权利或契约产物的观点，明确指出国家并非建立在某种先验的“普遍意志”或道德协议之上；相反，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伴随社会分工深化、私有制确立和阶级分野形成而必然出现的政治组织形式。

“唯物的历史观，从下述的原则出发，即：生产和生产之后的产品的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出现于历史上的社会中，产品的分配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阶级或等级的划分，是由这个社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因之，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求之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也不应该求之于人们对于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理解之中，而应该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之中；这些原因，不应求之于哲学，而应求之于各该时代的经济。对于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与不公平、和对于‘聪明变成了愚蠢，好事变成了坏事’的日益觉醒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标志，指示着在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之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这样的变更，使得从旧的经济条件产生出来的社会制度，已经不能和这些变更相适应了([6], pp. 283-284)”这一原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生产方式的变迁，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制度与阶级结构的演变。恩格斯正是基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进一步分析了国家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

随着社会分工的持续扩展和私有财产制度的固化，社会逐渐分裂为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不同的社会集团，这些集团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为避免社会在无休止的斗争中走向瓦解，就必然要求一种看似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缓和冲突，并将其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恩格斯深刻指出，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7], pp. 1876-1887)。国家由此成为维持统治阶级利益、调控社会矛盾的关键装置。

就国家本质而言，恩格斯认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该阶级通过掌握国家机器，不仅在经济领域，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确立其支配地位，从而获得系统镇压与剥削压迫阶级的制度化手段。因此，国家绝非如杜林所声称的那样是一种中立、超越阶级的“维护权利的力量”，恰恰相反，它是统治阶级实施权力、巩固特权的核心机制。恩格斯通过对杜林的批判，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法学和政治学中将国家神秘化、普遍化的意识形态遮蔽。

恩格斯尤其强调国家与阶级统治之间存在本质联系。他认为，氏族社会中，男人压迫女人，奴隶主剥削奴隶，而且，剥削阶级都是将被剥削的阶级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随着社会的发展，剥削阶级剥削

的对象由原来的土地和牲畜转为货币[2]。而现代代议制国家则是资产阶级剥削雇佣劳动者的政治形式。尽管国家形态在历史演进中呈现出多样性，但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实质始终未变。这一论断彻底解构了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平等”国家的神话，揭示出形式民主背后的阶级统治实质，从而为无产阶级认清国家本质、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武器。

3.2. 国家的职能与发展趋势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国家职能及其历史发展趋势作出了系统阐述，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内涵。恩格斯指出，国家在本质上具备双重职能：一是政治统治职能，即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通过暴力机关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社会管理职能，即承担公共事务的组织与调控，保障社会秩序和再生产过程的基本稳定。这两种职能并非彼此割裂，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阶级统治职能构成国家的本质属性，决定其历史类型与政治形式；社会管理职能则服务于统治职能，为其提供合法性基础与社会运行条件。这一经典论述科学地揭示了国家既是阶级统治工具、又履行公共管理职责的双重角色，打破了将国家功能单一化的理论误区。值得深入辨析的是，这两种职能之间存在复杂的矛盾统一关系：一方面，社会管理职能的履行能够缓解社会矛盾，增强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当社会管理职能的扩展与主导社会集团的短期利益发生冲突时，后者往往会以前者的牺牲为代价，从而加剧而非缓解社会对抗。恩格斯敏锐地把握了这种张力，为理解国家行为的复杂性提供了辩证视角。

恩格斯特别批判了杜林关于未来“共同社会”仍须保留军队、警察、司法等暴力机器的设想。杜林将其视为维护所谓“个人自主权”的永恒保障，认为即使在未来社会中，这些制度仍应作为集体掌握的力量继续存在。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这种观点本质上仍未摆脱资产阶级国家观的局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普鲁士国家结构的隐性辩护。它忽视了国家的历史性与暂时性，将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组织形式非历史地永恒化，从而在理论层面否定了国家终将消亡的必然规律。

针对杜林的错误，恩格斯坚决强调，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并非从来就有，也不会永恒存在。它是社会发展到出现阶级和阶级对抗阶段的产物，随着阶级的产生而逐渐形成；相应地，“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7], p. 190)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正在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一专政本身并非最终目的，而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它既是最后一种国家形式，也是政治国家逐步退场的转折点。

关于政治国家的退场的具体历史条件，恩格斯做出了科学的预见。他指出，国家的消亡必须以阶级的彻底消灭为前提。当不再存在需要镇压的社会阶级，当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彻底克服了“生存斗争”和无政府状态，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镇压职能就将失去存在意义。此时，“国家权力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6], p. 297)之后则是“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6], p. 297)恩格斯特别强调，国家不是通过外部法令“被废除”的，而是在其历史使命完成之后，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基础上逐步“自行消亡”的。这一论断不仅与无政府主义“一夜之间废除国家”的空想主张划清界限，也明确了国家职能的历史性转变的物质性和历史性特征，体现出恩格斯国家理论高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

3.3. 新型无产阶级国家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新型无产阶级国家理论做出了系统阐述，这一阐述建立在对杜林改良

主义观点的深刻批判之上。针对杜林反对社会变革中的强力手段、主张通过渐进改良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倾向，恩格斯坚决强调了社会根本性变革及其新型国家形态的历史必然性。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和政治领导，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政治民主制度。恩格斯说，这是“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7], p. 190)他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实现真正的解放，必须通过彻底的革命行动摧毁旧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建立起新型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结构。这一论断不仅澄清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改良主义在革命路径问题上的根本区别，也进一步夯实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石。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对社会变革中的强力手段的简单否定，并从历史哲学的维度重新确立了社会变革中的强力手段的正当性与进步性。他指出，暴力在历史进程中不仅扮演着压迫与保守的角色，更具备革命的建构性功能。借用马克思的经典比喻，恩格斯强调，“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6], p. 296)换言之，它是社会变革借以突破僵化政治结构、推动形态更迭的必要工具。这一深刻论述揭示了这种手段在制度更替中的历史作用，为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时，应当支持和利用现有的政治参与形式这种形式来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为最终的革命做准备。他强调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某种扩展的政治参与框架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他认为，这种现成的政治架构，经过革命改造后，能够成为无产阶级行使统治权力的重要制度载体。与此同时，恩格斯还强调，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全面主导上层建筑。这不仅意味着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统治，更包括对文化、舆论和教育领域的引导，以此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并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国家职能的历史性转变的历史条件与过程。他指出，国家形态的演进并非人为废除的结果，而是以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基本前提。关于这一前提的具体内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早已做出经典论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8], pp. 435-436)只有在这样的阶段，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彻底消失，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功能也随之失去意义，从而逐渐走向自行消亡。这一科学论述清晰指明了国家职能的历史性转变的物质性和历史性，驳斥了任何超越阶段的空想主义观点。

4. 恩格斯国家观的理论贡献与当代价值

恩格斯的国家观不仅在与杜林的论战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而且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深入挖掘恩格斯国家观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4.1. 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贡献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首先，他系统阐述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揭示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特征，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观关于国家是超阶级的普遍利益代表的神话。这一观点为我们正确认识国家现象提供了科学指导。

其次，恩格斯阐述了国家职能的二重性，指出国家既有政治统治的职能，又有社会管理的职能。他对二者辩证关系的深刻分析这避免了对国家职能的片面理解，既反对了只强调政治统治职能而忽视社会管理职能的片面性，也反对了只强调社会管理职能而否定阶级统治职能的错误观点。再次，恩格斯提出

了关于政治国家的退场的理论，指出国家是一个历史现象，它随着社会分层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亡。这一观点既反对了无政府主义者要求立即废除国家的错误主张，也反对了社会主义者认为国家是永恒存在的错误观点。

此外，恩格斯还阐述了新型国家形态的理论，指出了社会根本性变革和新型国家形态的历史必然性，强调了改造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新型国家形态的必要性。这一理论为社会变革实践提供了思想武器。

最后，恩格斯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国家制度的设想，指出在未来社会中，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这一设想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

4.2. 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的国家观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这种指导意义并非抽象的教条，而应体现为对具体治理议题的分析能力。

以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为例，恩格斯关于国家本质与职能的理论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国家在调节资本、引导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深刻的分析框架。首先，恩格斯揭示的国家本质属性，有助于我们清醒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社会公平和人民利益的侵蚀。国家在调节劳资关系、规范平台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的积极作为，正是其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与超越资本的公共权力之间张力的体现。其次，恩格斯关于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论述，则为理解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进行宏观调控中的主导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前，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既发挥资本积极作用、又有效控制其负面影响的治理道路，这一探索本质上是在实践恩格斯关于国家必须驾驭经济力量而非被经济力量所驾驭的思想。

以近年来对平台经济的规范治理为例，国家通过反垄断、数据安全立法等手段，对资本的无序扩张进行规制。这一行为并非简单的“市场干预”，而是在更深的层面体现了恩格斯所论述的国家作为社会“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当资本的逻辑威胁到社会稳定与公平时，国家必须行使超越于个别资本利益之上的公共权力。这种实践既印证了恩格斯关于国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点，也启示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确保国家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最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先验论国家观的批判，需要我们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从实际出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反对各种形式的先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总而言之，恩格斯的国家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入挖掘和发展恩格斯国家观的理论内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

5. 结语

基于《反杜林论》的文本与理论分析，本文系统阐释了恩格斯的国家观，认为其构建了一套完整而科学的理论体系。恩格斯通过批判杜林的错误国家理论，清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本质、职能及发展趋势的核心主张，进一步巩固并推进了唯物史观的国家学说。

具体而言，恩格斯深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强调国家本质上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不是代表阶级的普遍利益。这一论断彻底解构了资产阶级国家观的意识形态遮蔽，为国家理论研究确立了科学基础。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提出国家具有双重职能，即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体现出对国家作用的辩证理解，避免了片面认知。同时，他将国家界定为一个历史范畴，认为其随阶级社会的出现而诞生，也将随

着阶级的消亡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该观点既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立即废除国家”的空想，也否定了将国家永恒化的错误论调。进一步地，恩格斯强调了社会根本性变革与新型国家形态的历史必然性，主张必须通过革命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无产阶级国家，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恩格斯的国家观对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现代政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它不仅为国家本质与职能的认识提供了根本依据，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Lovell, D.W. (1984) *From Marx to Lenin: An Evaluation of Marx's Responsibility for Soviet Authoritaria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98372>
- [2] Blackledge, P. (2017) Practical Materialism: Engels's 'Anti-Dühring' as Marxist Philosophy. In: Carver, T. and Farr, J.,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e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9-101.
- [3] Panchenko, O., Hryshchenko, V. and Hryshchenko, I. (2020) The Issues of Law and the State in F. Engels's Work "Anti-Dühring". *Philosop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of Law*, **20**, 86-92.
- [4] 李天姿. 对象、实质与根源:再谈《反杜林论》“世界模式论”中恩格斯对杜林哲学的批判[J].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25(1): 181-190+370.
- [5] 刘娜娜. 恩格斯晚年国家起源理论再研究[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6(3): 18-22.
- [6] 恩格斯. 反杜林论[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83-284, 297, 296, 331, 388.
- [7]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86-187, 190.
- [8]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35-436.